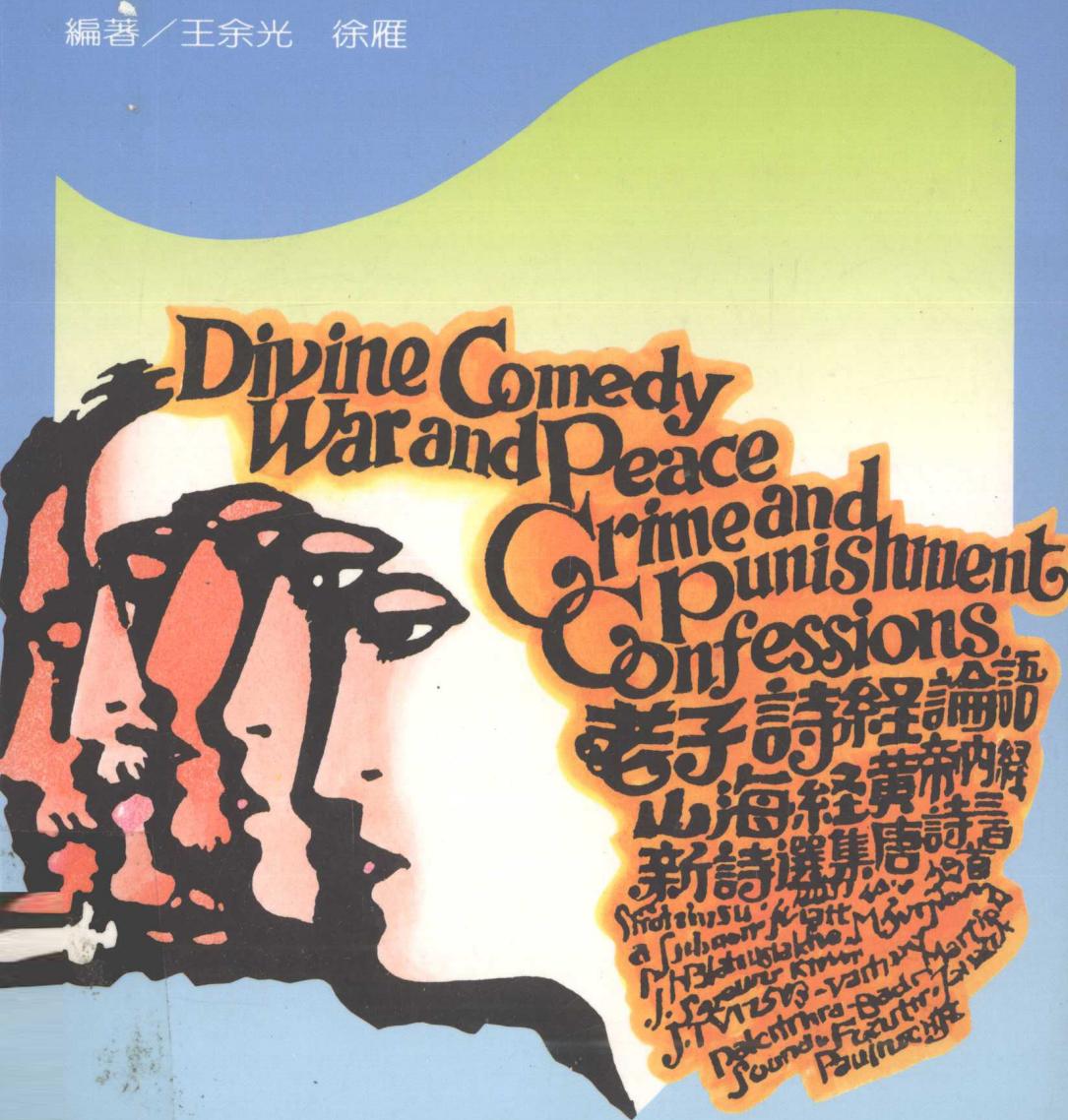


# 名人讀書錄

編著／王余光 徐雁



# 名人讀書錄

(下)

王余光 徐雁 主編

授學出版社



## 名人讀書錄（下）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初版 定價200元

原出版者：南京大學出版社

作 者：王余光 徐 雁 編著

出 版 者：授學出版社

發 行 人：崔湘山

地 址：台北市萬盛街130巷22號2樓

電 話：932-8114 932-8375

郵 撥：11118192/戶名：授學出版社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第5937號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名人讀書錄

徐 雁 王三山 何錫章 等著  
張 之 蔡賡生 王余光

## 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筆畫順序)

王勤	王三山	王長恭	王余光
王燕均	葉繼元	方厚樞	印永清
齊寶惠	劉怡	西天錫	朱育培
朱劍平	伍玲玲	孫德元	汪耀華
宋路霞	李永祥	李忠清	蘆玲
楊軍	楊濤	肖瓏	吳向東
何小清	何紹紅	何錫章	張之
張祥浩	張穗華	陳征	陳亮
陳捷	陳友慶	陳東華	陳江峰
陳傳夫	陳良璜	陳杰翔	鄭寧
林申清	洛雪婕	趙毓芳	胡成
胡先媛	姚伯岳	賀錫翔	高信
袁華	賈舒	錢軍	錢婉約
倪曉健	徐雁	徐狀華	卿家康
黃鶯	黃鎮偉	常仲哲	彭建炎
雷紹鋒	譚華軍	蔡賡生	熊遠報

# 序 言

徐 雁

(南京大學出版社)

假如說“積書而讀，丹鉛治學”(徐雁《封建時代私家藏書歷史價值的評價標準》)是中國私家藏書的優秀傳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讎通義·自叙》)是中國古典目錄的優良傳統的話，那么，“篤學致知，明理力行”就可以說是中國讀書史的優良傳統了。證之《名人讀書錄》中所收羅的古今中國文化名人讀書事迹，可知斯非虛言。

《名人讀書錄》共有六百四十六篇，以中國古今人物為主，兼及國外名人的讀書史實。其中“名人讀書史迹”選收現存可訪或舊存可考的與中國文化名人讀書事迹有關的各地名勝，諸如讀書臺、讀書處、讀書洞、讀書岩、著書處等書香史迹。大抵自故老相傳的位于甘肅天水縣渭南鄉的“伏羲氏畫卦臺”始，迄現存于安徽無為縣羊山鄉田

氏老宅內的現代作家“日間讀書處”止。“名人讀書生活”則收自中國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至現代作家馮驥才止，附收古羅馬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354—430)以來迄日本文學家井上靖(1907—1990)為止，凡東西方文化名人\_\_\_\_\_人讀書生活實錄。“名人讀書精論”，選收包括上述人物在內的有關圖書、鑒賞、藏書、訪術、品評等方面睿語雋論。自墨子(約前468—前376)、荀子(約前313—前238)始，迄現代作家鐵凝(1957—\_\_\_\_\_)“論書應該比人更堂皇”止，附收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前469—前399)以來迄當代英國學者、書評家約翰·蘇特蘭“論暢銷書”為止。“名人讀書方法”，選收自中國讀書方法論奠基人孔子始，迄當代作家賈平凹(1953—\_\_\_\_\_)，附收古代阿拉伯學者阿維森納(980—1037)起、迄日本NHK放送局知名節目主持人鈴木健二為止的讀書方法。因此，本書實為“中外名人讀書錄”，其所涵蓋的面，涉及的人，具有廣泛的代表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這樣一部讀書錄，實證了中國讀書史的優良傳統，乃是“篤學致知，明理力行”。這八個字，可謂中國世代讀書人所謹守不渝的秘律。我在一百捌拾萬字的《中國讀書大辭典》總序《讀書之樂》一文中所引述的楊玉清先生于一九四〇年為重慶《讀書通訊》創刊號所說的“讀書人應該把一切書本上的教訓，發為自己的行動。……能輔世長民，能經天緯地，那才真正是中國之所謂讀書人”，而明

未顧憲成為無錫東林書院所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聯語，都足證中國古典讀書精神自孔子“學而知之”以“求仕行道”以來，正是幾千年一以貫之地沿着“篤學致知，明理力行”的軌迹而運行的，“篤學”以“致知”，“致知”以“明理”“明理”以“力行”正是中國讀書人的“三部曲”。舉凡背弃這“三部曲”的讀書人，“篤學”而未“致知”者，終為被人譏笑的“書簏”而遺憾終身，“篤學致知”而不“明理力行”者，終為被人耻笑的“書蠹”而遺臭萬年。

“萬古分明看簡冊，一生照耀付文章。”（元代金陵詩人謝宗《書燈》詩句）咏的雖是古代的“書燈”，實則寫出的卻是古人讀書的心音，他們青燈黃卷，正是為了自己不至子“一生低首短檠前”（陸游詩），成為于家于國于天下百無一用的書生！因此，我作為《中國讀書大辭典》的總策劃，在浩翰辭海中拈出“篤學致知，明理力行”八個字，并撰此序文以為彰明，正是期許本書的讀者，都能在開卷之前，先行玩索此語的底蘊，以為讀書的南針。修身而齊家，輔世而長民。庶幾無愧于中國文化殿堂書香！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三日序于  
南京鼓樓四條巷雁齋

# 讀書之樂

(前言)

## ——秋禾——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咏春風香。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新竹壓檐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  
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  
北窗高卧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  
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  
近床賴有短檠在，及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  
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  
地爐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這 是文化中國傳世很久、傳人甚廣的關於春夏秋冬四時讀書  
情趣的著名組詩。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蘇州，它曾成為明代  
“吳中四才子”之一、書畫大家文征明着墨的題材，被繪成“布景設  
色、清雅絕塵”的《四時讀書樂圖》，為江南收藏家珍賞秘鑒，世代相  
傳；它也曾被演為磚刻這種藝術形式，鑲嵌于古城民宅的門樓之上，與其主人朝夕相伴，出入相親。誠然，《四時讀書樂》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或者說是詩畫并茂，景情并茂，以其蘊含的無限書香雅  
趣，點綴着古城小巷的人文風情，尤其是它那“凡人及時讀書，便可  
無時不樂”的理性主題，曾幾何時，又構建了多少讀書人在漫漫歷  
史歲月里和坎坎坷人生旅程上的精神家園，鞠育了多少書童學子于  
書卷中求學求知，并甘為中國文化香火之傳人的志願抱負？

《四時讀書樂》，相傳是宋元間學者翁森（字秀卿，號一瓢，浙江  
仙居人）所撰。它以生動的藝術形式，綺美的文學意象，概括了中國  
古典社會的讀書情趣。唯其生動，也唯其綺美，它才在中國讀書史上  
廣為播頌千余載，膾炙人口數百代。遠的不說，僅在本世紀成名的  
學者和作家中，就有鄭逸梅、季羨林、陳從周、梁厚甫、陸文夫、鮑  
昌、許杰等許許多多先生對此過目難忘，并因而對他們個人的讀書  
生活發生了潛潤暗滋的有益影響而至今心口相誦。而組詩中反復  
涵咏的“讀書樂”的主題，則古今中外，不僅有孔子、孟子、王充、陶  
淵明、杜甫、陸游、王艮、李贊、顧炎武、孫慶增、梁實秋、林語堂、李  
平心、施蟄存、孫犁、憶明珠、羅蘭以及格雷（Viscount Grey）、胡  
佛（Herbert Hoover）、班那特·塞夫（Bennett Cerf）、羅斯福夫人  
(Mrs. Roosevelt)等許許多多中外名人以此為題撰寫詩文，發揮過  
“讀書樂”的精義，在現當代更有以此題名行世的衆多文集、衆多報  
刊。可見，讀書真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動人心弦的主題！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宋代文豪蘇軾是這樣來從頭昌明一部浩瀚的中國學術發展史的。而在民間，“積財千萬，無過讀書”（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更是多少年間中國傳統家庭所恪守不移的信條。他們敬惜字紙，勤耕苦讀，追求的是一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他們的心目中，太平盛世，耕讀傳家，是人生在世的至高境界。直到現在的中國，還有不少父母要在小兒周歲生日時，把書籍、銀幣、烏龜、香蕉等物件一起放到嬰兒的面前，看他最先主動抓取什么，以卜其未來前程。如果抓到的是書的話，則預示着他將來會讀書求進，成為一個知書達理、富有學問的“秀才”。這將是使其父母長久感到欣慰的事。“辛苦莫忘晨夜讀，買書錢是績麻錢。”（周矩《聞彭兒讀論語》詩）實際上，有許多父母也正是基于嬰兒“抓周”時偶然抓取了書卷這一事實，而含辛茹苦、百折不撓地開創條件，讓他讀書識字，最終為國家為民族撫育出了一個“讀書人”——一個可能在中國文化的博大殿堂里，“與先聖先賢并肩論道，弦歌不輟，永世長青的開啓着、建構着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高上秦《一個中國古典知識大眾化的構想》，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版《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因此，在中國科舉時代，人們常常會把一函圖書與杏枝、花瓶畫于尺幅之中，贈送給赴京趕考的學子。這其間正蘊含着“讀書成名、科考高中”的吉祥寓意。

**昔**日，中國的讀書問題曾經倍受歷朝歷代的重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隋代初創科舉制度以后，歷時 1300 余年的科舉制度更不知造就了多少由童試而秀才、由分試而舉人、由會試而貢士、由殿試而進士的讀書士子。而進士的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更是在十年寒窗苦讀之后，一舉成名天下知，人品

晉階，衣錦還鄉，極一時之榮寵。相傳宋真宗趙恒就曾以其“九五之尊”而作《勸學詩》雲：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然而，識字知書、金榜題名的“樂趣”對於學童卻是無意的。“家塾讀書須十紙，山園上樹莫千回”（陸游《示諸孫》），求學和嬉樂畢竟是孩童世界最為衝突對立的兩件事了。在長輩世俗的逼迫下，非要懸梁刺股、囊螢鑿壁地苦讀，將何樂之有呢？於是，在北方很早就流傳有這樣一首關於讀書的古老兒歌：“春困秋乏夏打盹，守着火爐待明年。”說的就是學童以讀書為苦的事。無獨有偶，在南方流傳的則是：“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過了秋天又冬至，收拾書箱過新年。”雖然題名為《四季讀書歌》，但實際上詠嘆的卻是“四時不學調”。在讀書苦這一主題上，同前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誠然，中世紀以來中國的舊式教育，大抵多以熟讀硬記為手段，以博取科名為宗旨。為指定的若干兔園冊子，冷凳寒壁，雖有“黃金屋、顏如玉”之類的瑰麗目標，但那份好處，生當其時、身在其中的學童確是領會不到的。實際上，“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余。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于寒苦而不足”（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確已失讀書的高尚旨趣和原始真諦。“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于觀書。”蘇軾這句話，似已揭示出讀書原本是人類對知識的一種應有的進取探求之心的行為體現。

“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韓愈《符讀書城南》），“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王安石《贈外孫》），“名場未捷寧妨學？史限雖嚴不廢詩”（陸游《示子聿》），可見，苦讀應是一種求知的手段，而并不一定爲了功名利祿。讀書要培養一份情趣，求知的過程中，更要提煉一種自覺。掌握知識，改造社會，應當才是讀書求知的終極關懷。正如林語堂所指出的：“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練’，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學’。他們只是愛好書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隨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讀書。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他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都會讀書。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也都會讀書。”（《人生的盛宴》）而讀書，“從淺近方面說，是要增加個人的知識和能力，預備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材；從遠大的方面說，是要精研學理，對於社會、國家和人類作最有價值的貢獻”（《蔡元培教育論集》）。也許正是悟覺到了這一層深義，在中國讀書史上雖不乏“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的皓首窮經的學子，也不乏“北窗高卧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的清高雅士，更不乏“讀書入學莫徘徊，可以升官又發財”（吾盧孺《京華慷慨竹枝詞》）的追名逐利的書生，但更多的則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憲成題聯）的志士仁人！

因此，在1940年5月1日于四川重慶出版的《讀書通訊》半月刊的創刊號上，楊玉清先生在其《論讀書》一文中，對“中國讀書人”作出了這樣一個嚴肅的界定：

以讀書為混文憑的人，不是讀書人；  
以讀書為混官做的人，不是讀書人；  
以讀書為時髦、為裝飾品的人，更不是讀書人。  
讀書人應該把一切書本上的教訓，發為自己的行動。

“輔世長民莫如德，經天緯地謂之文。”

能輔世長民，能經天緯地，

那才真正是中國之所謂讀書人。

是的，正是這樣的讀書人，才是中國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的優秀傳人，才是維系着民族生存和昌盛的真正脊梁。

那麼，就讓我們一起打開那神聖莊嚴的書卷，來結識這宗人類智慧最卓越的創造物吧。

人 創造了書。書卷記錄了人類的歷史，人的認識與探求，人的思想與情感，人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都在書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書是人類進步的有力見證。因此，書卷對於整個人類的關係，就好象記憶之與個人的關係一樣。同時，書又培育了每一代人。它不僅是長智長慧的鑰匙，開啓了人類走向一個又一個未知世界的門扉，而且是一艘永大永動的航船，把人們從狹隘的地方，載向無限廣闊的生活海洋。書又是人類進步的堅實階梯。因此，蘇聯作家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說道：“熱愛書吧——這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夠使我們從精神上成為堅強、忠誠和有理智的人，成為能夠真正愛人類、尊重人類勞動、衷心地欣賞人類那不間斷的偉大勞動所產生的美好果實的人。”(《高爾基論青年》)而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也這樣說：“任何地方，不僅在我們這時代，書籍正是一切知識的泉源，各種科學的開端。一個人和書籍接觸得愈親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統一，因為他的人格復化了：他不僅用他自己的眼睛觀察，而是運用着無數心靈的眼睛；由於他們這種崇高的幫助，他將懷着摯愛的同情踏遍整個的世界。”(《書的禮贊》)

而有着悠遠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更是一個重古訓、尊先法的民族，對前人聖賢的大道理看得特別重。正如臺灣學者黃俊杰所總結並指出的：“因中國歷史傳統富有強烈之歷史延續性，故一切人文學術之研究，必先能守舊而后才能開新”，“一切人文社會科學之論述如能植根于中國文化之傳統，則必不流為橫面之移植而能進而為縱面之繼承，并寓開來于繼往。”（《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代序）在這樣一種民族心理結構之中，結晶着先賢聖哲思想的圖書，就不僅具有一種純粹的學術價值，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行為諸多層面都發生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用。

是的，僅有 1.2 萬字左右的《論語》，作為孔子的語錄，幾乎一問世就受到人們的尊崇。漢代之后，它幾乎是每個讀書人的必讀之書。到南宋，經過朱熹的注解之后，便一直成為科舉考試的最重要的教科書，宋元明清幾朝的做官人、讀書人無不受其影響。縱是在科舉廢除以后，《論語》還是讀書人經常誦讀的書。自其行世以來，僅歷代學者為之注釋疏證的著述就已逾 3000 種。直至今天，該書仍是一版再版，在華人世界的發行量之大是驚人的。書中許多詞語，即便是在當今這白話文的時代，仍被人們在書面上或口頭上常常使用。可以說，《論語》自行世以來的 2000 余年間，對中國政治、思想、教育、倫理等多方面無不產生極其廣泛的影響。因此，《論語》便有了“中國人的聖書”之稱。

其實，又何止《論語》如此？“先民的歌唱”《詩經》、“哲學的天籟”《莊子》、“澤畔的悲歌”《楚辭》、“儒者的良心”《孟子》，還有那“帝王的鏡子”《資治通鑑》……，在中華民族那輝煌燦爛的文化殿堂里，“大道名儒，各樹一幟；詩詞曲調，連峰疊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構成了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實體，并壘起了這一

厚重國體的思想基礎，塑造着民族的靈魂與性格”（王余光《書與人類進步》，見《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引論）。卷帙浩繁的“中國古典名著”，曾幾何時感召着多少代人去進取拼搏，去自強不息？

然而，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無情地震驚了這個東方的泱泱大國，也把它那古雅博大的文化推向了新的時代，讓它直面世界潮流的嚴峻考驗。中國需要改變，文化需要轉型，一批呼呼要革新舊有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圖書，在時代變革的大潮中涌現出來了。于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孫中山的《建國方略》、魯迅的《阿Q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批倡言新思想、新學說的圖書先后問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這些掀濤拍岸的“中國近現代名著”，同東漸日深的“漢譯世界名著”一起，甚至進而改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走向。

圖 書同人類史之間的交互關係是如此的密切，它們自然引發了中外學人的深刻思考。他們或者宏觀地研討衡定哪些書曾經至關重要地驅動過世界社會歷史的步伐，或者具體地考察評估哪些書曾有益地改造了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精神文化，或者致力于對成名者“影響最大的書”的微觀分析，總之，是從書與人的關係方面，展開了“影響書目”的探討。于是，我們就擁有了在本辭典《讀書博聞錄》“中外讀書珍聞”部類里所收錄的“人類有史以來的二十本最佳書”、“世界最偉大的三十份文獻”、“震撼世界的十本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本書”、“塑造現代文明的一百一十本書”和“影響美國特性最大的十本書”、“影響美國文化的十二本書”、“改變美國的二十五本書”、“美國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三十二本書”以及“影響日本近現代文化的一百本書”等林林總總的“影響書目”。

在中國，則更早地就開始了遴選“中國文化必讀之書”的工作。百余年來，曾國藩、張之洞、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蔡尚思、嚴耕望等知名學者先后針對不同的對象，在不同的時代和範圍里，作出過排選最有代表性的或最有影響的國學書目的嘗試。到了當代，臺灣和大陸的學者更是熱情地投注于中國歷史範圍內的“影響書目”的評比。因而，我們也就先后獲知了“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影響臺灣 40 年的四十本書”、“改變中國的一百三十九篇劃時代文獻”等琳琅滿目的經典文獻。至于朱光潛、梁實秋、林語堂、嚴耕望、劉紹棠、陳從周等知名學者和作家，也象英國文學家毛姆(William S. M.)、美國學者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和德國獲 1929 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等，留下了一份份富有啓迪、足資研討的“最喜愛的書目”和“受影響最大的書目”。這些書目活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且不論它從書籍文化的角度，質感地概括了文化學術發展的歷史輪廓，也不談它們對民族文化的別具一格的光大弘揚，單道它們對於讀書人口(相對於社會自然人口而言)的涵育意義就非淺鮮。正如臺灣知名作家、出版家林良(子敏)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樣：“‘選書活動’是值得提倡的。書單子很能制激讀書欲，很能培養愛書心。常讀書單子的，早晚會成為一個愛書人，會喜歡跟知識和文學接近，成為‘人中的大木’，成為‘人中之蘭草’。”

也許正是因為書卷具有那麼深厚博大的內涵，所以，無論是先民還是現代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於尊書愛書、讀書藏書的感情和熱情都概莫能外。然而，相形之下，素稱“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則又是“世界上最早喜愛藏書和讀書的國家”(季羨林《藏書與讀書》，載《光明日報》1991 年 7 月 25 日“圖書評論”版)。當我們憑吊着